

从共存到种族灭绝：巴勒斯坦的系统性毁灭

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是族群和谐的灯塔。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其中约25,000名塞法迪和米兹拉希犹太人生活在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地区——在耶路撒冷、希伯伦和雅法等城市中共存。他们共享市场、社区和传统文化，奥斯曼的米利特制度为犹太人等少数群体提供了受保护的地位。尽管偶尔会出现小规模紧张局势，但暴力冲突十分罕见，社会联系往往超越了信仰界限。这种脆弱的和平被一项殖民计划摧毁，该计划优先考虑欧洲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而忽视了巴勒斯坦土著多数的权益，最终导致了77年的剥夺、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由西奥多·赫茨尔在1897年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正式发起，并于1899年宣布巴勒斯坦为建立犹太国的目标，这一运动受到欧洲反犹主义和殖民傲慢的推动。由欧洲资本资助的小型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各地涌现，通过从不在场的奥斯曼地主手中购买土地，驱逐了当地农民。希伯来语作为现代语言的复兴巩固了一种分离主义的身份，疏远了与阿拉伯人融合的现有犹太社区。1917年，由犹太复国主义游说者罗thschild男爵策划的《贝尔福宣言》使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承诺将巴勒斯坦——一块他无权赠予的土地——作为犹太人的家园，忽视了阿拉伯多数的权利和愿望。

20世纪30年代，随着《哈瓦拉协议》的签订，局势进一步升级，这是一项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与纳粹德国之间的令人不安的协议。该协议将60,000名德国犹太人及其资产转移到巴勒斯坦，以换取德国商品。到1939年，犹太移民激增至450,000人，伊尔贡和莱希等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发动了恐怖活动。他们的爆炸事件，如1946年大卫王酒店袭击，造成91人死亡，以及对英国和阿拉伯目标的暗杀，使英国托管地无法治理。英国于1947年撤离，导致了联合国的分区计划，这一极其不公的方案引发了纳克巴，为巴勒斯坦人数十年的苦难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分区计划的不公

1947年的联合国分区计划（第181号决议）是一次殖民分割，挑战了公平和自决权。尽管巴勒斯坦人占人口的67%（120万），犹太人占33%（60万），该计划将巴勒斯坦56%的土地分配给一个犹太国家，包括肥沃的沿海地区和雅法、海法等关键经济中心。拥有94%土地并在此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巴勒斯坦人被压缩到43%——西岸和加沙的分散、较贫瘠的领土。该计划无视人口现实：犹太人拥有不到7%的土地，并且除雅法外，在每个地区都是少数。耶路撒冷，这座共同的圣城，被提议作为国际区，忽视了巴勒斯坦人的诉求。阿拉伯多数拒绝该计划，认为它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而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将其视为更大领土控制的踏板，之后他们扩展到分配边界之外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由西方大国主导的联合国在未与巴勒斯坦人协商的情况下强加了这一分区，反映了殖民傲慢，并将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望置于土著主权之上。

纳克巴及其遗产

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宣言引发了纳克巴——阿拉伯语中的“灾难”。超过70万巴勒斯坦人，占阿拉伯人口的一半，被犹太复国主义民兵摧毁500多个村庄时强行驱逐或在恐惧中逃离。代尔亚辛大屠杀等事件，超过100名平民被屠杀，巩固了恐惧。巴勒斯坦人被驱赶到加沙、西岸以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难民营，禁止返回。这场种族清洗由约瑟夫·魏茨等人物精心策划，他是犹太国家基金的官员，1940年宣称：“这个国家没有两个民族的空间……唯一的解决方案是一个没有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为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国家奠定了基础。魏茨的强制“转移”愿景塑造了纳克巴的残酷性，并继续在巴勒斯坦人的剥夺中回响。

西岸的剥夺与流离失所

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西岸以来，剥夺一直在无情地进行。超过70万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非法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建在被盗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将西岸分割成不连贯的飞地。以色列的政策——土地没收、房屋拆除和限制性许可——迫使数万人流离失所。据B'Tselem统计，自1967年以来，超过20,000栋巴勒斯坦房屋被拆除，常常以缺乏许可证为借口，而以色列很少发放许可证。在约旦河谷和东耶路撒冷等地区，整个社区面临驱逐；例如，马萨弗亚塔的1,000名居民因扩大军事区而面临被驱逐的威胁。受以色列法律和军事保护支持的定居点扩张，夺取了西岸40%以上的土地，巴勒斯坦人被限制在165个受到严格控制的“岛屿”中。检查站、路障和2004年被国际法院裁定为非法的隔离墙，将家庭、农田和生计分割，使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难以维持。这种系统性的盗窃，结合拒绝建设权，迫使人们流离失所，同时巩固了种族隔离。

西岸的定居者暴力

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暴力是日常的恐怖，由国家共谋得以实现。定居者通常武装并受以色列军队保护，攻击巴勒斯坦农民、牧民和村庄，目的是将他们从土地上驱逐。仅在2024年，联合国记录了超过1,200起定居者袭击事件，包括纵火、破坏和人身攻击。在胡瓦拉和库斯拉等村庄，定居者焚烧房屋、橄榄园和牲畜，2023年胡瓦拉大屠杀等事件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以色列士兵往往袖手旁观，或干预保护自己的巴勒斯坦人。B'Tselem报告称，定居者在军事前哨的支持下，为巴勒斯坦人创造了“禁区”，通过暴力夺取了数千英亩土地。像“山顶青年”这样的极端定居者团体公开旨在驱逐巴勒斯坦人，受到负责定居政策的政府人物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的鼓励，他曾呼吁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征服”。这种很少被起诉的暴力是种族清洗的工具，使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岌岌可危。

种族灭绝的言辞与行动

以色列领导人的言辞长期以来将巴勒斯坦人非人化，为暴行提供正当性。约瑟夫·魏茨在1940年呼吁一个没有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这一呼声在几十年后被欧瓦迪亚·约瑟夫·艾坦等人物所呼应，这位前将军在1983年将巴勒斯坦人比作“瓶子里的醉酒蟑螂”，这是对其监禁和消灭的恶毒隐喻。最近，2023年10月，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对加沙实施了“完全封锁”，宣称：“没有电，没有食物，没有燃料……我们在与人类动物作战。”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主张完全摧毁加沙，在2023年表示“抹去加沙”是必要的，支持饥饿和轰炸。这些声明，结合封锁和不断的空袭等行动，与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定义相符：故意摧毁一个群体的行为。自1967年以来每年举行的耶路撒冷旗帜游行，数千名以色列极端民族主义者，包括定居者，在东耶路撒冷高喊“

杀死阿拉伯人”，这是一个受警察保护的仇恨仪式。2024年，游行袭击了巴勒斯坦商店和记者，没有显著后果，使种族灭绝情绪正常化。

加沙的持续种族灭绝

加沙，一个200万人的365平方公里监狱，面临无休止的恐怖。自2023年10月以来，根据加沙卫生部估计，以色列军队杀害了超过60,000名巴勒斯坦人——70%是妇女和儿童。加兰特和斯莫特里赫的封锁加剧了饥饿，80%的加沙人挨饿，180万人面临严重的食品不安全（联合国，2025年）。2025年成立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援助点是死亡陷阱：超过743名巴勒斯坦人被杀，4,891人受伤，常常是因为在寻找食物时遭到以色列枪击和轰炸。国际特赦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称这些行为可能是战争罪，联合国将以色列的饥饿政策标记为种族灭绝。医院、学校和难民营成为废墟，加沙90%的基础设施被摧毁。暴行——儿童被枪杀，家庭被埋在瓦砾下，群众被屠杀——反映出消灭一个民族的精心策划意图。

结论

从19世纪的共存到今天的种族灭绝，巴勒斯坦的故事是殖民掠夺、背叛和无情残暴的故事。联合国分区计划的不公、纳克巴的种族清洗以及西岸持续的剥夺和定居者暴力形成了一个压迫的连续体。从魏茨到加兰特的种族灭绝言辞，被“杀死阿拉伯人”的呼声放大，助长了一个在巴勒斯坦人痛苦中蓬勃发展的体系。加沙的屠杀，超过60,000人死亡，不仅是一场悲剧，更是全球沉默促成的人道罪行。巴勒斯坦的斗争不仅要求铭记，更要求正义。